

唐翼明《魏晉清談》析評*

王妙純**

(收稿日期：101年3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1年7月26日)

提要

「清談」是中古時期的一種特殊風尚，同時也是魏晉名士才情最集中的表現。「清談」不僅是名士的標誌，也是士人求官進身的敲門磚。「清談」影響了當代的哲學、文學、史學與美學；「清談」也是魏晉風度具體而微的展現。

唐翼明先生所著《魏晉清談》，是一本獨立而全面地介紹魏晉清談的專書。之所以「獨立」，乃是因前人往往將清談現象混合著魏晉思潮、玄學、以至政治和社會等等來談論，而作者卻能當做一個獨立的歷史現象來處理。之所以「全面」，則是因為從來沒有人將清談做縱向、橫向全面式的處理，而本書不僅縱向地探討清談的起源、發展與演變，又能橫向地探討清談的內容與形式。《魏晉清談》可謂是研究魏晉學術、思想與文化者，不可不讀的一部書。

本論文共分成如下章節：一、前言。二、《魏晉清談》之創見。三、對《魏晉清談》之建議。四、結論。

關鍵詞：唐翼明、魏晉、魏晉清談、清談、《世說新語》

* 感謝匿名審查學者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對於本文觀念之釐清與修訂均有莫大助益，於此特申謝忱！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唐翼明先生，湖南衡陽人，國立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碩士、博士。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已退休。學術專長為魏晉文學與思潮，曾講學於美、日等國。學術專長為魏晉文學與魏晉思潮，曾講學於美、日等國。主要著作有：The Voices of Wei-Jin Scholars：A Study of Qingtan、《古典今論》、《魏晉清談》、《魏晉文學與玄學》等。主要著作有《The Voices of Wei-Jin Scholars：A Study of Qingtan》、《古典今論》、《魏晉清談》、《魏晉文學與玄學》等。

《魏晉清談》是一本關於「清談」的學術著作，¹它的出版讓唐翼明教授成為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文化的知名學者。唐翼明教授認為「魏晉之際中國經歷了一次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與文藝復興。而這次解放與文藝復興所憑藉的學術手段就是清談。」²他指出清談是一種高級的學術社交活動，不是瞎聊天。唐翼明教授認為人們對魏晉清談的誤解非常嚴重，故而他的工作就是要釐清魏晉清談之面貌，讓人們重新認識魏晉時代的清談活動，本書為我們展示了魏晉清談之內容與形式的整體面貌，以及清談形成與演變的輪廓。全書材料豐富、分析深入、條理分明、立論有據、文字簡潔，凡研究中國魏晉之學術、思想與文化、文學者皆不可不讀。王葆珖先生即說：

書中舉出大量的史料，廣泛參考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對魏晉清談的名義、形式、內容及其演變歷史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盡且最具條理的論述，全書思路敏銳，文辭典雅，其學術成就實不容忽視，為關心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所必讀。³

范子燁先生也稱道：

此書旁徵博引，幾乎將魏晉清談有關的學術資料一網打盡，同時加以細緻、嚴密而

¹ 本論文所引之唐翼明：《魏晉清談》均以（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為版本，以下所引之《魏晉清談》均依據此版本，不再加註，只標註頁碼。

² 唐翼明：〈緒論〉，《魏晉清談》，頁7。

³ 王葆珖：〈讀《魏晉清談》〉，《孔子評論》（1994年4月），頁119。

準確的科學分析，於是清談問題的各個方面，從微觀到宏觀，從具體到抽象，畢現無遺。此書在清談的研究方面，堪稱集大成之作，書中的許多觀點可以視為定論。⁴

余英時先生也盛讚本書填補了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頁空白：

《魏晉清談》是唐翼明先生費了好幾年研究工夫所寫成的一部專著。作者對於這一專題在現代的研究狀態，包括中國的日本的和西方的，作了一番通盤的檢查。他很驚奇的發現，儘管現代研究涉及這一題旨的文獻汗牛充棟，我們還是沒有一部專書全面地論述「魏晉清談」的形成和演變。由於作者的辛勤努力，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一空白點現在即將因本書的出版而填補上了。⁵

有了這三位學者的背書，就可知道這本書絕對是屬於重量級的一本書了。不管在清談的內容形式，或是清談的來龍去脈，乃至於文獻的探討上，本書都給予後學者不少的收穫與啟發。它在清談研究之路上，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二、《魏晉清談》之創見

（一）對清談名義之創見

唐翼明先生所撰《魏晉清談》一書，首先就「清談」的名稱提出質疑，他指出：「當時（指魏晉）的『清談』一詞根本沒有特指玄談這種用法，例如記載魏晉玄談資料最多，以致被陳寅恪先生稱為『清談總彙』的《世說新語》就從頭至尾沒有『清談』二字，不僅正文沒有，連劉孝標的注文中也沒有。」⁶他認為「清談」一詞的早期含義與現在的意思有很大的不同。唐君所言，打破了一般學術界對「清談」的成見。一是「清談」是負面多於正面的成見；二是「清談」即是特指談玄的成見。這種突破性的創見，贏得了王葆玟先

⁴ 范子燁：〈引言〉，《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

⁵ 余英時：〈《魏晉清談》序〉，收於唐翼明：《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1。

⁶ 唐翼明：〈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魏晉清談》頁20。

生的注意：

唐翼明先生……這一番精彩的論述使學界注意到了「清談」概念中的可疑之處，使玄學研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現在看來，對「清談」的研究還有繼續深入的必要。⁷

王葆玟所言極有道理。所謂「熟視無睹」、「習焉不察」，因為學界早把魏晉談玄之風稱為清談，清談就是談玄。大家也都習以為常，沒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合理性。而作者卻能突破慣性思考，反其道而行，將「清談」兩字還原於歷史時空，做了前所未有的整體考察。作者發現「清談」早期之原義，應是指雅談、美談或正論。而到後來，「清談」今義變成指空談、玄談、玄學思潮。今義中的空談、玄學思潮完全是後起的，與「清談」一詞原義無關。今義中的「玄談」乃來自於原義中的「雅談」。而到底「玄談」、「雅談」是談些什麼呢？作者以為應是特指「以學理討論為主的清談」。作者發現當《世說新語》出現「談」或「清言」的地方時，都可以肯定是談玄，尤其是「清言」，其特指的意味最強，所以，若不考慮約定成俗的原則，「魏晉清談」應正名為「魏晉清言」。⁸作者這番言論，聞所未聞，頗為中的。

（二）對清談定義之創見

作者試圖對「魏晉清談」下一個十分簡明的界說與現代的定義，他說：

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⁹

⁷ 王葆玟：《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167。

⁸ 作者曾云：「說實在的，如果只考慮準確性一端，則『魏晉清談』這個術語實不如更名為『魏晉清言』更好，既於史有據，又無歧義，不致引起誤解和混淆。」見唐翼明：〈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魏晉清談》，頁42。

⁹ 唐翼明：〈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魏晉清談》，頁43。

這個定義已獲得學界不少人之認同。¹⁰范子燁先生即認為這個定義不僅適用於魏晉清談，也足以傳達清談的真實意義。¹¹唐翼明先生列舉了六條理由說明他為什麼對「魏晉清談」作如此的界定。¹²而余英時先生對此清談之定義與如此定義之理由均深表贊同，他說：「我覺得他（唐翼明先生）的理由都是足以成立的，從這一觀點來看，清談的重要性不僅在它的思想內容，而是在它的表現的方式。作者在本書一再的強調『清談』是一種『智力遊戲』，是一種『社交活動』，而不能看作是純粹的學術研究。這是一個十分準確的觀察。」¹³顯然地，余英時先生非常贊同作者對清談形式的定義——「講究修辭技巧的談說論辯」、「是一項精緻的智力活動、社交活動」。然而唐翼明先生提醒讀者，不能太過強調清談的遊戲性、社交性，以致忽略了清談「求真」、「認真」的精神：

儘管清談有遊戲性、社交性的一面，後期這種色彩更濃，但畢竟它是一項精緻的、學術性很強的智力活動，跟一般的遊戲不同，即使有爭勝的心理羈雜其中，而求真的本性始終未去。我們研究清談時不可不注意到它的遊戲意味和社交色彩，但也不

¹⁰ 認同此定義之學者頗眾，茲舉其要者：一、蔡振豐：《魏晉名士與玄學清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頁21。二、范子燁：《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43。三、劉正國：〈給魏晉清談以公正的評價〉，《江漢大學學報》第16卷第4期（1999年8月），頁51。

¹¹ 參見范子燁：《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43。

¹² 唐翼明先生所列舉的六條理由如下：第一、這個定義排除了廣義的清談，即將魏晉清談作為魏晉思潮的代名詞。第二、這裏說的「貴族」，指當時的門閥士族，以別於寒庶或平民。因魏晉清談名士，無一不出身於門閥士族，處於社會的頂層。第三、這裏說清談的內容是「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方式是「講究修辭技巧的談說論辯」，這就把一般的談話、聊天或具體的人物批評以及兩漢經師的講經等等區別開來。魏晉清談從本質意義上講，應是一項精緻的學術活動、智力活動，它有特定的內容和形式，並逐步發展出一套約定俗成的規則。第四、說清談的內容是「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而不說「《老》、《莊》」或「三玄」（《周易》與《老》、《莊》）這樣就使它的涵蓋面較廣。清談不等於思潮，但清談的內容反映了思潮。第五、說清談談的是「哲理」，這也很重要。若談的是具體的東西，如具體的人物批評，都不能叫作「清談」的，標準的清談談的是抽象、形而上的理，而不是具體的、形而下的事。《世說新語》中的眾多例子都說明只有談這些形而上的理的時候，才被稱之為「清言」，亦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清談」。第六、說清談以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這是稍留餘地。因當時的人在清談之後常常要著說立論來繼續發揮自己的觀點，如果不死扣字眼，這也可視為清談的另一種方式，至少是一種補充的方式。詳見唐翼明：〈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魏晉清談》，頁43-44。

¹³ 余英時：〈《魏晉清談》序〉，收於唐翼明：《魏晉清談》，頁1。

宜把這一點強調得過了頭。¹⁴

無論是學術性探討或遊戲鬥勝，當時知識分子對清談的態度卻是相當認真的。……並不是如現在有些人設想的，以為魏晉人是一邊清談，一邊飲酒，悠哉遊哉。¹⁵

唐氏所言甚是。而錢穆、余英時賢師徒則強調清談的遊戲性、社交性之屬性，認為不能將清談視為純粹的學術研究。錢穆以為清談「實非思想上研覈真理探索精微之態度，而僅為日常人生一種遊戲而已。」¹⁶余英時則言清談「不能看作是純粹的學術研究」。¹⁷然而唐翼明先生卻認為清談畢竟還是一種學術活動的，他說：「（清談）因為有學術的一面，所以可供研討、供切磋、供校練、供學習。」¹⁸又說：「大體說來，早期的清談求理的一面超過求美的一面，學術探討的意識較濃，說理貴簡約、貴理中，不涉或少涉意氣。」¹⁹筆者以為唐翼明的觀察應是相當中肯而更符合歷史實情。至於清談與學術的關係，盤根錯節，容於後文詳說。

（三）對清談形式之創見

作者在本書頁 12 曾自述為什麼會把「清談的形式」列為重要的考察重點，是因為「至今沒有一本系統地從各方面探討魏晉清談的專書，已有的幾本多偏重在清談的內容一點上……清談的某些方面至今沒有觸及或很少觸及，例如清談的形式問題。」²⁰於是作者在本書〈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分別從「清談的參與方式」、「清談的程序和術語」、「清談的準備」、「清談的理想境界」、「清談的心智娛樂和社交色彩」等五個向度（章節）來談清談的形式問題。

以「清談的參與方式」一節而言，有（1）一人主講式（2）二人論辯式（3）多人討論式。作者引用《後漢書》與《世說新語》二書中的例子來舉證，說明「一人主講式」帶

¹⁴ 唐翼明：〈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魏晉清談》，頁 87。

¹⁵ 同前註，頁 84。

¹⁶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87。

¹⁷ 余英時：〈《魏晉清談》序〉，收於唐翼明：《魏晉清談》，頁 2。

¹⁸ 唐翼明：〈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魏晉清談》，頁 81。

¹⁹ 同前註，頁 83。

²⁰ 唐翼明：〈緒言〉，《魏晉清談》，頁 12。

有濃厚的講經遺痕；「二人論辯式」是當時最常見、最有效，也是最成熟的清談方式；「多人討論式」較為少見，因參加者都必須是旗鼓相當的清談高手且對討論題目均得相當熟稔，故此種盛會並不多見。唐翼明先生舉證歷歷，言之鑿鑿，令讀者不得信服。

再以「清談的程序和術語」一節而言，作者從《世說新語·文學篇》歸納、統整清談的程序和術語。有關清談之術語，作者列出「談客」、「敘理」、「作難」、「辯答」、「番」、「屈」、「盡與通」、「遊辭」等詞，作者企圖全方位地勾畫魏晉清談在形式方面的大致輪廓，甚具學術創見與參考價值。有關清談之程序，作者論道：

參加的人都是喜愛清談、善於清談的人，即所謂「談客」或「能言者」，這些人聚集在一起，構成一個「談坐」。作為主角的兩個人則分「主」、「客」兩方。主方首先發言，提出個論點，並加以簡明的論證，叫做「敘理」。然後由客方提出詰問或反駁，稱為「作難」，或簡稱「難」。客方作難後，主方當然要「辯答」。一難一答，稱「一番」。再難再答，便是第二番。如此往反，可至數十番。最後必有一方詞窮，就叫「屈」。如客方屈，則主方所持之理，叫做「勝理」；反之，如主方屈，則客方所持之理就是「勝理」了。清談活動到此也就告一段落。此時如有新人加入，對剛才的「勝理」進行挑戰，就構成一組新的「客主」，於是另一輪論辯就開始了。²¹

作者狀清談場面於目前。無疑的，這些清談的程序和術語，都是在當前的清談論著中，比較沒有人探討的領域、區塊。作者能言人所未言，發人之未發，甚有學術的敏感度。筆者以為，清談的程序與今日的辯論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今日的辯論模式涵蓋以下四種模式：一、申論。二、質詢。三、答辯。四、結辯。²²而「申論」相當於清談中的「敘理」，即由主方敘理而引發辯論；「質詢」相當於清談中的「作難」，作難就是發難，就是「提出問題」或「提出反駁」的意思。由此可見，人類不分古今中外，都是非常好辯的。只是，魏晉的「清談」活動，是中國中古時期非常普遍的文人生活的縮影；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瑰寶。

²¹ 唐翼明：〈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魏晉清談》，頁62。

²² 參見諸承明：《縱橫辯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71-92。

（四）對清談起源之創見

唐翼明先生認為魏晉清談起源於東漢末太學裏的「游談」之風，²³而非目前學術界公認的起源於漢末的人物批評或議論時政（即所謂「清議」）。²⁴作者引用當時太學生仇覽所云：「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之句，²⁵因而抽出「游談」的概念，用這兩個字來概括東漢太學「浮華」而不修章句之風。²⁶作者以為在漢末黨錮事件前後，由於京師太學的發展和現實政治的刺激，逐漸在太學諸生中形成了一種交游與談論（「游談」）的新風氣，他們議論時政、品評人物，同時也討論學術思想。作者也澄清「游談」並非「清議」，雖然「游談」的內容固然也有「清議」中人物批評與議論時政的部分，但必然地也有學術思想的討論與交流，作者認為這種討論學理的成分，才是後來清談的主要源頭。²⁷他的說法提出之後，即有許多學者表示認同，大陸學者范子燁先生即言：

唐翼明先生以為清談的遠源乃是漢代經學，其近源則是漢末太學的游談之風，此說獨具慧眼，言而有徵。如果從清談的「純學術」的特質方面著眼，顯然他的這一觀點更符合清談的歷史實際。²⁸

²³ 唐翼明先以為清談的遠源是兩漢的講經，而其近源則是東漢末季京師太學裏形成的「游談」之風。見唐翼明：〈第四章·清談的醞釀與成形〉，《魏晉清談》，頁 169-179。此外，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年）一書亦持此說，可互資參考，見頁 150。

²⁴ 對於清談的起源，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它起源於東漢時代的人物品評——「清議」，陳寅恪、湯用彤、楊勇三位學者為此說之代表人物。

²⁵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76·循吏列傳·仇覽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 年）記：「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常，守之何因？』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床為拜。」頁 2481。

²⁶ 太學生浮華之風見《後漢書·卷 79·儒林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 年）序：「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頁 2547。

²⁷ 唐翼明：〈各章內容提要〉，《魏晉清談》，頁 3。

²⁸ 范子燁：〈第四章·清談的歷史還原〉，《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

王葆玟先生也說：

在這個問題上（指魏晉清談與漢末清議的關係），《魏晉清談》的作者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即將魏晉清談與漢末太學中的「游談」聯繫起來。……「游談」概念的提出以及與此有關的分析，標誌著魏晉清談研究的一項重要的進展。這一研究進展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其一便是可由此而進行推論，說明漢末太學中的「游談」即「交游清談」的簡稱，其中「談」即清談。²⁹

兩位學者對唐翼明先生「游談」之說，均表贊同。把「游談」視為清談的起源，不失為一個重要的考察面向，它提供了讀者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在「游談」之風影響下，學術思想放棄泥守章句、墨守家法，轉向探求義理、追求融會貫通方面發展，自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漢末許多有作為的名士，都「不好章句」、「不守章句」，而重視「博」、「通」，也就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了。³⁰故魏晉學術能不墨守成規，走向博通，這未嘗不是清談之功。

三、對《魏晉清談》之建議

（一）清談的內容應包含「人物品評」

唐翼明先生以為魏晉人所義界的清談應不包含人物品評。他說：「具體指實的人物批評與品鑒雖然在魏晉時依然存在，卻不被當時人視為『清言』——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清談』。而只有探討人物批評與品鑒的原理部分，如前面談到的『才性辨析』，才能叫作『清言』。」³¹又說：「如果是具體的政治批評、具體的人物批評，都不能叫作『清談』的，標準的清談談的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而不是具象的、形而下的事。」³²由於作者已將「清談」二字還原當時的歷史情境，魏晉人所認為的「清談」，即是《世說》中的屢見的「清

年），頁 147。

²⁹ 王葆玟：〈讀《魏晉清談》〉，《孔子評論》（1994年4月），頁 120。

³⁰ 參見唐翼明：〈第四章·清談的醞釀與成形〉，《魏晉清談》，頁 177。唐翼明先生舉出漢末學者如荀淑、盧植、韓融等均「不好章句」，參見該書頁 177 註 14。

³¹ 唐翼明：〈第三章·清談內容考察〉，《魏晉清談》，頁 158。

³² 唐翼明：〈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魏晉清談》，頁 44。

言」。而當《世說》出現的「理」、「名理」、「虛勝」、「玄遠」、「義理」、「微言」、「玄言」、「道」的字詞時，所指涉的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哲理，都不是形而下的具體政治、人物批評，所以作者認為嚴格說來，「人物批評」並不在清談內容的清單上。然考察近代研究清談的學者，大部分的學者還是把「人物品評」放入清談之中，如林麗真、曾師春海、唐長孺、周紹賢、楊勇、李春青、孔繁等人均持這樣的看法。大陸學者張海明即言：

如果我們將清談理解得寬泛些，那麼還應該包括人物品鑒和名士間的閑談。人物品鑒本承漢末清議而來，一方面由具體而抽象，上升為對玄理的探討；另一方面，品評之風仍十分盛行，同樣是名士相聚時談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至於名士間的閑談，有的也的確很難和清談截然區分。³³

又說：

人物品鑒是漢末清議與魏晉清談的重要聯接點，漢末清議正是經由人物品鑒走向魏晉清談。雖然魏晉清談主要以「三玄」為談資，清談名士的興趣更在於抽象的玄理，但人物品鑒無疑仍是清談的內容，仍在魏晉士人的生活中有著足舉輕重的分量。³⁴

張氏從寬處理解清談，這應是一般人對清談的理解。然由於對「清談」定義的廣狹寬窄不同，於是也影響到清談內容的義界、判定。唐翼明先生從窄處詮釋清談，固然沒有錯，然其定義畢竟稍嫌嚴格、狹隘。他以為人物品鑒之理（即人物品鑒方法論）可算清談，而人物品鑒則不能算清談，因為前者是形而上的哲理，後者是形而下的人事。若將人物品鑒也納入清談之內容，這就會違反了他對清談的定義——「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所以他強力地將「人物品鑒」置於「清談」之外。然筆者以為清談中仍應有人物品鑒之內容才是，因為魏晉人物品鑒之風氣極盛，談士幾乎都是箇中高手。王戎「有人倫鑒識」，³⁵王衍「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³⁶桓彝「有人倫鑒識」，³⁷劉渙「少

³³ 張海明：《玄妙之境——魏晉玄學美學思潮》（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07。

³⁴ 同前註，頁121。

³⁵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卷43·王戎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1235。

³⁶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篇〉第11條注引《晉陽秋》，頁510。本論文所引《世說新語》之內文，乃根據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仁愛書局，1984年）為主。

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³⁸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³⁹阮文業「清倫有鑒識」。⁴⁰擅長人物品鑒之談士，不勝枚舉。魏晉談士不僅深諳此道，且還熱衷此道。若說談士清談之時，不品鑒人物，或避談人物，這似乎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清談與品鑒人物並不容易切割劃分，且兩者常是如影隨形，《世說·文學篇》第 22 條記：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嬰如生母狗馨。」（頁 212）

此次清談，除王導、殷浩兩位主角外，尚有桓溫、謝尚、王濛、王述等配角，俱是一時之選，場面可謂不小。清談之後，王導將此次清談稍做總結，說他與殷浩兩人措辭譬喻不相上下，並將此盛會媲美為「正始之音」。次日，桓溫也發表感言，他對王、殷二人之表現讚許有加，他與謝尚也都有會心之處，唯王濛、王述像剛生育的母狗般，一副畏人之狀，顯得局促不安，桓溫語尾加上「馨」字助詞，更活脫地表現了對二王的輕蔑。可見從清談到人物褒貶、人物品評，這是非常自然的反應。二者有如孿生兄弟，實不可截然區隔，若說清談並不迴避人物品鑒，這應是合理的推測，尤其在那麼熱衷人物品評的文化氛圍中，談士更是無法置身其外。《世說》一書最可代表當代清談家所作的人物評論，在 1133 條的語錄中，直接或間接對人物之品題，至少佔一半以上，特別是〈識鑒篇〉28 條、〈賞譽篇〉156 條、〈品藻篇〉88 條，三篇共 272 條中，記載了許多魏晉時代的人物品評，這份量幾乎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強。張海明先生即言：「雖然很少有人稱《世說新語》為人物品鑒之專書，但《世說新語》突出人物品藻的特徵無疑是相當明顯的。……可以說，人

而為行文之方便，有時逕以「《世說》」稱「《世說新語》」。以下所引之《世說新語》均依據此版本，不再加註，僅標註頁碼。

³⁷ 《世說·賞譽篇》第 65 條注引《徐江州本事》，頁 459。

³⁸ 《世說·賞譽篇》第 22 條注引《晉後略》，頁 433。

³⁹ 《世說·品藻篇》第 15 條注引《八王故事》，頁 512。

⁴⁰ 《世說·賞譽篇》第 13 條，頁 425。

物品鑒是《世說新語》編撰的一條潛在的貫穿線索，正是有了這條線索的存在，才使得《世說新語》所記諸材料成為一個整體。」⁴¹王能憲先生更認為《世說》門類之設置「差不多都是以人物品題和鑒賞為視點而區分的。」⁴²大陸學者張叔寧先生甚至以為《世說新語》門目之排列，是模仿「九品中正制」的做法，由上而下，呈九級（品）排列，隱含品第之順序，並寓含褒貶。⁴³顯然地，三位都把《世說》認為是「人物品鑒」之書。倘若說人物品鑒不是清談，那麼陳寅恪所云「《世說新語》乃記錄魏晉清談之書也」⁴⁴則就有待商榷。饒宗頤先生說《世說》是「人倫之淵鑒，言談之林藪。」⁴⁵林麗真先生也說「《世說》的人倫品藻，則是魏晉清談風流的表露。」⁴⁶筆者認為此二賢所言極是，因為當時名士最頻繁的活動便是清談與人物品題，而這兩者似乎有著千絲萬縷、斬之不斷，錯綜複雜的內在聯繫。

（二）清談的遊戲特質應詳言之

作者在本書〈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中談及清談的心智娛樂和社交色彩，並說：「（清談）因為有學術的一面，所以可供研討、供切磋、供校練、供學習；因為有藝術的一面，

⁴¹ 張海明：《玄妙之境——魏晉玄學美學思潮》（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19-121。

⁴²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1。

⁴³ 大陸學者張叔寧先生以為，《世說新語》門目之排列，是模仿九品中正制的做法，其分級如下：一品：德行門。德為儒之首，立此以為全書的榜樣。二品：言語、政事、文學三門。承儒家立功、立言的傳統。三品：方正、雅量二門。為《世說新語》所表彰推崇的優良品性。四品：識鑒、賞譽、品藻三門。為《世說新語》重點表現的內容。五品：捷悟、夙慧、豪爽三門。為《世說新語》所欣賞肯定的品性。六品：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六門。主要為《世說新語》所肯定的行為。七品：術解、巧藝二門。《世說新語》客觀記載的一些奇技，無褒無貶。八品：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五門。所收為《世說新語》不很贊成的行為，貶多於褒。九品：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訛漏、惑溺、仇隙十門。所收為《世說新語》所貶斥的品性和行為。張氏以為人物品題的社會風尚對《世說》的分門設目有一定的影響。魏文帝曹丕將這種人物的流品劃分運用到政治上，而將士人分為九等，這也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張氏認為《世說》門類的排列順序即是仿此「九品」而來，故隱含品第之順序，並寓含褒貶。筆者以為此說亦極富創見。見張叔寧：《世說新語研究》（江蘇：南京出版社，1994年），頁24-26。

⁴⁴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025。

⁴⁵ 收於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序》（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1。

⁴⁶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年），頁176。

所以可供娛樂、供消遣、供欣賞、供觀摹。這兩面的組合，使清談成為當時貴族知識分子中一項有益的文化活動及有趣的智力遊戲。」⁴⁷作者觀察到清談的遊戲性格，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看法，但作者卻沒有針對此點再加以闡發。

魏晉人以清談為遊戲，《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19 條「王衍嫁女」一則記當時婚後三日諸婿大會，座中賓客有郭象，他刻意挑裴遐清談較量，遐善談義理，為眾稱譽，其丈人王衍驚喜之餘，忙說：「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⁴⁸同篇第 62 條「羊孚弟娶王永言女」一則載羊孚送其弟羊輔至岳家巧遇殷仲堪而論談，羊孚自負才氣，許下四番後，對方便會認同自己的看法，孚雅善理義，終使殷仲堪心悅誠服讚他為清談新秀。⁴⁹由此可見時人把即興清談視為風流韻事，而清談不限人物、時間、場地，沒有預設立場的隨機性、自由性、活潑性都在此二例中展現無遺，遊戲意味都相當濃厚，《世說新語·言語篇》第 23 條也記：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頁 83）

楊勇先生以為文中「戲」字即指「清談」，其意尤顯。⁵⁰錢穆先生論此條也言：「此事尚在渡江前，已見時人以談作戲。……各標風致，互騁才鋒，實非思想上研覈真理探索精微之態度，而僅為日常人生中一種遊戲而已。」⁵¹楊勇、錢穆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了清談的遊戲性格。此外，《世說·言語篇》第 79 條記：「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

⁴⁷ 唐翼明：〈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魏晉清談》，頁 81。

⁴⁸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19 條記：「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語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頁 209。

⁴⁹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62 條記：「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頁 241。

⁵⁰ 楊勇：〈論清談之起源、原義、語言特色及其影響〉，收於氏著：《世新語校箋論文集》（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3。

⁵¹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87。

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頁137）戰爭術語進入了清談之語境，可見游戲之烈。錢穆先生又論此條曰：「此故事在渡江後。益見時人以談作戲，成為社交場合之一種消遣與娛樂。」⁵²而考察《世說》與一些史書也發現，當時人們常以「談戲」、「語戲」、「戲詞」、「言戲」等詞彙代稱清談：

晉文帝親愛籍（阮籍），恒與「談戲」。（《世說·任誕篇》第5條注引〈文士傳〉，頁730）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世說·簡傲篇》第2條，頁766）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晉書·卷66·陶侃傳》）⁵³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世說·任誕篇》第25條，頁742）

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三國志·卷29·魏書·管輅傳》）⁵⁴

（呂安）求康兒共「語戲」。（《世說·簡傲篇》第4條注引干寶《晉紀》，頁770）

以上諸例所言之「談戲」、「言戲」、「語戲」、「戲詞」者，乃是同義複詞，似不能分置。由此可知，時人以談作戲之清談趣味。此外，《世說·容止篇》第24條亦有「詠謔」一詞，⁵⁵亦是清談的另外名稱，故不論是「戲」、「談戲」、「語戲」、「戲詞」、「言戲」、「詠謔」等詞，均一致說明了清談的游戲特質。

在古代中國，對於「游戲」一詞，人們往往是取其貶義，如《晉書·卷39·王沈傳》記載：「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⁵⁶即便今日，我們的新聞媒體以及日常語言，也充斥著大量與「游戲」相

⁵² 同前註，頁187。

⁵³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卷66·陶侃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1774。

⁵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29·魏書·管輅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811。

⁵⁵ 《世說·容止篇》第24條記：「公許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頁618。

⁵⁶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卷39·王沈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1145。

連的詞彙，諸如：愛情遊戲、性遊戲、文字遊戲、政治遊戲、經濟遊戲……等，亦是以負面姿態出現。然而在近代西方學者卻是很認真地看待「遊戲」，並從而看出它的積極面。如康德認為：「自由是遊戲的靈魂所在，而藝術的精髓也在於自由，從而使遊戲與藝術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它們都標誌著活動的自由和生命力的暢通。」⁵⁷伽達默爾更看出遊戲的嚴肅面。他說：「只有當遊戲者全神貫注於遊戲時，遊戲活動才會實現它所具有的目的，使得遊戲完全成為遊戲的，不是從遊戲中生發出來的與嚴肅的關聯，而只是在遊戲時的嚴肅，誰要不嚴肅地對待遊戲，誰就是遊戲的破壞者。遊戲的存在方式不允許遊戲者像對待一個物件那樣去對待遊戲。」⁵⁸伽達默爾還認為，遊戲還具有另一性質，即遊戲是遊戲活動者的自我表現。而魏晉清談即是有如上積極、正向的遊戲性格，在清談之中，談士們體現了生命力的自由暢通，展現了自我學術藝文之高度涵養，他們嚴肅而認真地看待清談遊戲。「在看似天馬行空、荒誕不經和玩世不恭的清談背後，卻有著士人們對生命意義的嚴肅追求和執著。」⁵⁹許多名士談客為清談如醉如癡，為之冥思苦想、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嘔心瀝血者大有人在，甚至病疴纏身、勞累致死者亦不乏其人。

而「遊戲」不是比賽，故清談時未必一定要分出個高下，只要彼我盡興即可。「清談」因為帶有「遊戲性」，所以對學問的討論，也不必究論真理何在，故《世說·文學篇》第22條所謂的「乃竟未知理源所歸」，（頁212）最能體現這種清談的遊戲性格與精神。⁶⁰

（三）可以探討清談的說話藝術

由於清談是一種高度精緻化的展演藝術，故筆者建議本書可以探討並分析清談的藝術技巧與價值。而魏晉清談與《世說新語》一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陳寅恪云：「《世說新語》乃記錄魏晉清談之書也」（已見前文）；魯迅亦言《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玄談）的教科書。」⁶¹饒宗頤也云《世說》是「人倫之淵鑒，言談之林藪。」⁶²因為此書能教人清談與人物品評，故成為進身名士之教科書。而受清談風氣的影

⁵⁷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384。

⁵⁸ 洪漢鼎譯；H.G.Gadamer：《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頁132。

⁵⁹ 臧要科：〈魏晉清談：語言遊戲——以伽達默爾的遊戲概念為視角對魏晉清談的分析〉，《蘭州學報》總第144期（2005年第3期），頁87。

⁶⁰ 此段乃審查學者所言，其分析深中肯綮，筆者不敢摻美，茲錄於此。

⁶¹ 魯迅：〈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515。

⁶² 收於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序〉，頁1。

響與制約，《世說》的人物言語與敘事語言均簡約玄澹，韻味深長。⁶³正因為魏晉清談與《世說》兩者有互為因果錯綜複雜之關係，所以若從《世說》來研究清談之說話藝術，應不失為是最快速直接的方法。而據《世說》的記載，支遁解《莊子·逍遙篇》能「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⁶⁴即連信奉天師道的王羲之，從原本的不屑與之交談，到聽完支遁講《莊》之後，竟「披衣解帶，流連不已」，⁶⁵其態度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該書又載殷浩曾為謝尚闡釋義理，由於殷浩清言「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使得尚聽完「動心駭聽」、「流汗交面」。⁶⁶由此二例可知，出色的清談，必須「辭」「理」並茂，方能風流動人。

按《世說》編輯原則乃是「以類相從」，有關清談內容的直接記載，主要出現在該書的〈文學篇〉、〈識鑒篇〉、〈賞譽篇〉、〈品藻篇〉等篇，其中〈文學篇〉主要為「談玄」部分，而〈識鑒篇〉、〈賞譽篇〉、〈品藻篇〉為「人物品評」部分。〈文學篇〉偏重清談情境的復現及評價，〈識鑒篇〉、〈賞譽篇〉、〈品藻篇〉等篇，則收錄了談士之品人之雋語，示現了清談之語言藝術與技巧，茲據此四篇分析清談語言之藝術特色：

1. 崇尚簡約

清談玄風不僅造就一代哲學思潮，也影響一代文學語言風格。劉葉秋以為「魏晉人之清談以言約旨遠為貴」，⁶⁷而《世說》中的名士語言也反映了這「言約旨遠」的玄風玄語。〈文學篇〉第 18 條記：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

⁶³ 前人對清談與《世說新語》語言關係的研究，多是從總體上分析，寥寥數語，點到為止。唯明朝人吳瑞徵，則條分縷析，頗有創見，他將《世說》語言性質分六：（一）雅言。（二）捷言。（三）形言。（四）反言。（五）偏言。（六）超言。這六個特徵都與清談關係至密，吳瑞徵又言：「凡此六解，清論之宗。」我們幾乎可以說，這「六言」即是清談的語言風格。其中，「捷言」反應了語言的機智性，這當然與清談講究快速的理解力、思辯力、反應力息息相關。此外，「反言」即是「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這是老子的遺風餘韻，而《老子》也是清談談士所熱衷的時髦談資；「超言」不落言筌的語言方式，也與清談「重玄言、輕人事」的思潮密不可分，這些語言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也反映了清談的談話藝術。見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98~200。

⁶⁴ 見《世說新語·文學篇》第32條，頁222。

⁶⁵ 見《世說新語·文學篇》第36條，頁224。

⁶⁶ 見《世說新語·文學篇》第28條，頁218。

⁶⁷ 劉葉秋：《古典小說筆記論叢》（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轉引自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頁201。

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遂相與為友。（頁 207）⁶⁸

阮脩「將無同」一語，實消融了老莊與孔教之對立，默許了「名教即自然」之玄義。余敦康學者即讚「將無同」一語之妙：「理智上不敢遽然言其同，情感上不願遽然言其異，意思是『莫非相同吧！』以一種反問語氣與人商榷，把難題的解答推給對方，而自己則是模稜兩可，含糊其辭，依違於同異兩者之間，不作獨斷論的判定。即使自己擺脫了邏輯困境的糾纏，也給人們進一步的探索留下了廣闊的回旋餘地。」⁶⁹楊慎評曰：「晉人語言務簡，且為兩可之詞。『將無』疑言畢竟同也，悟此言筌，千載如面也。」⁷⁰阮脩「將無同」三字，深契魏晉玄學家不落言筌之精神風貌。《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16 條又載：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類此。（頁 205）

公孫龍著有《指物論》，以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莊子·天下篇》也載惠施之說曰「指不至，至不絕。」惠施認為指事不能達到物的實際，即使達到也不能絕對的窮盡。在這則事例中，樂廣藉麈尾柄敲（至）几而離（去）几為例，來說明「旨不至」之道理；也就是抽象概念不能與具體事物等量齊觀，本條劉孝標注云：「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頁 205）劉氏所言，讓人了悟解樂廣論證之奧妙。樂廣不落言筌的妙喻，與客人聰慧敏捷的妙悟，主客兩人均令人拍案叫絕。由以上二例可知魏晉清談內容之簡約精妙！

⁶⁸ 本事亦見於《晉書·卷 49·阮瞻傳》：「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頁 1363。兩者應以《晉書》為是，原因有二：一、王行為太尉在西元 309 年，此前阮脩已做了鴻臚丞，應不再為王衍所辟；二、《世說》下又有「衛玠嘲之」云云，按衛玠生於西元 286 年，少阮脩 16 歲，而與阮瞻年相若，衛玠嘲阮瞻較合情理，如嘲阮脩就未免有點輕狂了，見唐翼明：《魏晉清談》，頁 234。

⁶⁹ 余敦康：《魏晉玄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代序〉，頁 2。

⁷⁰ 劉強輯校：《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頁 120。

值得注意的是，玄學雖然崇尚簡約之風，但落實在語言表現上時，就未必僅是「簡約」一種風貌。如《世說·言語篇》第 23 條所載的「混混有雅致」；（頁 83）《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19 條所載「郭陳張甚盛」；（頁 209）同篇第 55 條言謝安「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頁 237）都是另一種語言表現的樣貌。而一場清談下來，能讓人「廢寢忘食、通宵達旦」，亦足見內容之豐。故清談語言不僅崇尚簡約，同時也崇尚豐富之美！⁷¹

2. 運用修辭

魏晉清談中的人物品評，「幾乎完全擯棄抽象的語言，極借助形象的比喻、象徵來表現人物的姿容、才情、風神。」⁷²談士擅於運用自然界中「水」的意象來喻示人物之辨才無礙，《世說新語·賞譽篇》曰：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第 32 條，頁 438）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奧，早已傾寫而見，殷陣勢浩汗，眾源未可得測。」（第 82 條，頁 468）

王衍使用了「懸河寫水」之意象，試圖以一種由上而下的姿態，來喻示這種「注而不竭」之意，它造成的效果是引起人們一種奔流不息的感覺，郭象辨才滔滔由此想見；殷浩清談陣勢浩瀚，所呈現的便是海納百川、滂沛洶湧之景觀，令人難測深廣。相形之下，王胡之「早已傾寫而見」的水，則不僅水量小，而且力道不足，⁷³於是兩人高下，分判立見。除了比喻外，談家還使用其它之修辭法，如排比、設問、引用等，限於篇幅，茲不具論。

3. 注重聲調

魏晉談士亦相當注重語言中的聲調音韻之美，《世說新語·品藻篇》第 48 條載：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頁 527）

⁷¹ 此段為審查學者的提醒，使筆者在分析清談語言藝術之時，能避免以偏概全、武斷片面之弊，於此特申謝忱。

⁷² 參見張海明：〈魏晉清談與《世說新語》的語言特徵〉（續），《遼寧大學學報》總第 149 期（1997 年第 6 期），頁 57。

⁷³ 參見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 68、73。

王濛曾自詡在「韶音令辭」方面，劉惔不如他；然在「往輒破的」方面，他不如劉惔。《晉紀》也載裴遐「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知與不知，無不歎服。」⁷⁴裴遐說理時，如琴似瑟的美質之音，無人不嘆服。由此可知當日談家非常注重音調之美，故余嘉錫即云：「晉、宋人清談，不惟善言名理，其音響輕重疾徐，皆自有一種風韻。」⁷⁵魏晉清談不僅造就一代哲學思潮，同時也將說話藝術推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四）可以闡論清談對學術的貢獻

魏晉著名的清談好手往往也是著書立論的高手，他們平時所談的談題，往往是平日熟悉書籍的心得報告，而在「口談」論辯完畢後，也常將意有不逮的地方，再書寫成籍，繼續以「筆談」來論辯。《世說新語·文學篇》記：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第 10 條，頁 201）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第 12 條，頁 201）

何晏見王弼後出轉精，於是捨《老子》注改作《道德論》；裴頠〈崇有論〉，除王衍外，無人能屈。這些著作，在當代都得經得起無數的口戰、筆戰才能被流傳。范子燁先生認為「口談是筆談的前奏，筆談是口談的深化。」⁷⁶林麗真先生說：「（魏晉）談家往往是藉著談辯以建立並充實自己的思想，故其所好之圖籍常是談辯時的資料來源，而其手成之著作也常是談辯後的思想記錄。」⁷⁷唐翼明先生也認為這些「筆談」，不妨視為清談的另一種方式：

說清談以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這是稍留餘地。因當時的人在清談之後常常要著說立論來繼續發揮自己的觀點，如果不死扣字眼，這也可視為清談的另一種方

⁷⁴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19 條注引鄧粲《晉紀》，頁 209。

⁷⁵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 19 條余嘉錫箋疏云，頁 210。

⁷⁶ 范子燁：《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74。

⁷⁷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年），頁 61。

式，至少是一種補充的方式。⁷⁸

這種看法可謂非常符合實情。從廣義而言，王弼的《老子注》、何晏的《道德論》、郭象的《莊子注》都是長篇的筆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歐陽建的〈言盡意論〉、裴頠的〈崇有論〉、謝萬的〈八賢論〉、孫盛〈易象妙於見形論〉都是短篇的筆談。這些著作，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清談的成果；而清談思想也藉著學術著作反映一二。雖然清談不能等同於思潮，但是清談的內容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代的學術思潮。

我們不妨從史書來看看這時期名士對學術之貢獻。《隋書·經籍志》著錄隋以前的圖書，四部經傳共 2127 部，36708 卷，除少數古籍外，大部分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所作，且都是魏晉人所作居多，其中，思想性的著作，更可以說大半成於魏晉人之手，這在中國學術著作史上，可謂是非常璀璨的時代。林麗真先生即指出：「我們從《隋志》之著錄，不僅可以窺知魏晉文化之澎湃及學術之大勢，對於成就這些著作背後的清談思潮，亦當可以略見津涯才是。」⁷⁹故對於魏晉學術之內容亦不可忽視，它幫助我們更理解魏晉清談思潮。

以經部而言，魏晉人對經學的貢獻不可說不大，今天所傳的《十三經注疏》，《易》為魏王弼注，《論語》為魏何晏集解，《左傳》為晉杜預集解，《穀梁》為晉范寧注，《爾雅》為晉郭璞注。此外，孔安國所注《尚書》傳乃魏晉人偽託，偽古文《尚書》亦出魏晉人編撰。值得注意的是，《易》與《論語》皆採用清談大師的注本，可見魏晉談士並非空疏淺薄之徒，其對於經學的詮解，儼然有成，且足以承先啟後。《四庫提要·周易註》下說：「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然平心而論，王何在魏晉的學術界，俱是有思想的頭等人物，他們以革命的態度，把前代腐化的經學，轉變了一個新方向。⁸⁰談士與經學如此密切，故合理的推測，魏晉談士應不迴避經義之探討，這可能性應是極大的，以《世說新語·文學篇》為例，第 29、56、61 條記載了談士以《易》為清談之主題；第 52 條以《詩》為清談之主題，顯現了魏晉談家對經學的深厚造詣。

以史部而言，魏晉史學與兩宋並稱史學的雙璧。許多的體例規模大體上是魏晉時代發

⁷⁸ 唐翼明：〈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魏晉清談》，頁 44。

⁷⁹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年），頁 59。

⁸⁰ 參見劉大杰：〈第二章·魏晉學術界的新傾向〉，《魏晉思想論》，收於賀昌群等著：《魏晉思想》（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頁 29。

展成熟的。《隋志·史部》將當時見存的 817 部史籍，細分成 13 類，有正史類、古史類、雜史類、霸史類、起居注類、舊事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雜傳類、地理記類、譜系類、簿錄類等。《隋志》又從〈六藝略〉的「春秋門」中獨立出來，一方面說明魏晉史學的內容已不復儒家經學所能籠罩，另一方面也顯示魏晉史學的體制與規模已漸臻完備，並多創新。尤其，最值得一提的，乃是當時對「人物傳記」的興趣，故與人物相關的地理背景、譜牒世系等，也連帶地被重視。此一特異現象，據錢穆先生研究，乃與當時矜尚士族門第有關。⁸¹而林麗真先生以為，這現象也未始不與清談主題有關，這反應當時談士對品評人物的濃厚興趣。⁸²由此可知，魏晉史學「人物學」的發達，實在不能抹煞清談的功勞。

以子部而言，與清談最有關係者，首推道家類，而清談名士涉足於其中者不下十數家。如王弼、何晏、鍾會、嵇康、孫登、張憑、向秀、郭象、陸雲、孫綽、晉簡文帝……等都有道家著作，雖大都亡佚，但存留至今著如王弼之《老子注》，向秀、郭象之《莊子注》，皆享譽極高，且與張湛之《列子注》、葛洪之《抱朴子》，並推為魏晉道學之代表。⁸³

以集部而言，魏晉之清談名士都有專集傳世：如魏之劉劭、何晏、王弼、傅嘏、夏侯玄、鍾毓、鍾會、嵇康、阮籍，西晉之山濤、向秀、荀勗、裴楷、裴頠、樂廣、陸機、陸雲、阮瞻、阮修、裴邈、郭象、顧榮、謝鯤，東晉之明帝、簡文帝、王敦、王導、庾亮、王濛、殷浩、王羲之、張憑、謝萬、許詢、支遁、孫綽、桓溫、庾亮、王述、王坦之、郗超、韓伯、謝安、習鑿齒、孫盛、謝朗、王獻之、殷仲堪、桓玄、釋慧遠、釋僧肇、謝道韞……等等，其作品或存或亡，或多或寡，《隋志》俱有著錄。可見當時清談名士並非空談不學之徒，其思想、言論、文章可資傳世者不為不少。⁸⁴

魏晉南北朝政治腐壞，篡亂相乘，兵戎迭起，中國版圖，半淪胡統。然學術尚有傳統，人物尚有規儀。⁸⁵從以上四部之分析，其學術文化鬱鬱蒼蒼，蔚為大國。世人均言清談誤國，然清談對當代學術文化的貢獻，實不可抹煞。唐翼明先生在本書未言清談對學術之影響，然在 2004 年所出版的《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一書中，似乎對此現象進行補過和加強，他認為以往中國學術的傳播都是靠宮廷系統或是學校系統，而「清

⁸¹ 詳見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43。

⁸² 詳見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年），頁 63-66。

⁸³ 同前註，頁 66-67。

⁸⁴ 同前註，頁 69。

⁸⁵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34。

談」卻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新的學術傳播方式。⁸⁶又說：「清談的傳播學術，也不僅限於辯論當時的口耳之間。清談之後，論辯雙方常常會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文學，或作為進一步的論辯的基礎，或在朋友中流傳。」《世說·文學篇》記：

殷融字洪遠，陳郡人，……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第 74 條注引《中興書》，頁 256）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第 5 條，頁 195）

殷融「口才」不如其姪殷浩，於是下了談座後大展「筆才」；鍾會畏嵇康問難，而改以「筆談」，顯然地，他怯於與嵇康「口談」。顯然地，當時擅長口談者的地位遠勝於筆談者的地位，王葆玟先生即言：「口頭的、即興的清談的確比玄學著作更受重視；清談家的寥寥數語，竟比連篇累牘的玄學著作更有影響。」⁸⁷王衍、樂廣雖無著作，然不妨礙其在西晉清談的領袖地位。儘管著作能贏得身後名，然當時這些談家，其對當代學術之影響與貢獻都是不容忽視的，王葆玟先生又道：「何晏之成為曹魏正始時期的學界領袖和思想史上的名人，主要原因不在於他主持編撰了《論語集解》，亦不在於他寫過《道德論》，而在於他的清談使同時代人震驚，從而影響了一代學風。」⁸⁸王氏言人之未言，極有見地。談士有的擅長口談，有的擅長筆談，有的兼而有之。在口談與筆談的交涉、對話下，兩者相輔相成，於是造成魏晉學術上的黃金時代。歸根究柢，這未嘗不是「清談」之功。故唐翼明先生在《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一書中又指出：「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學術藉清談而傳播而普及的深度與廣度遠遠超過學校系統，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段很特別的經歷。」⁸⁹這個看法，不失為是一個非常敏銳而有深度的觀察。

⁸⁶ 詳見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年），頁 121-122。

⁸⁷ 王葆玟：《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62。

⁸⁸ 王葆玟：〈讀《魏晉清談》〉，《孔子評論》（1994 年 4 月），頁 120。

⁸⁹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年），頁 125-126。

肆、結論

唐翼明先生所著《魏晉清談》為我們展示了魏晉清談之內容與形式的整體面貌，以及清談形成與演變的輪廓。全書材料豐富，條理分明，分析深入、文字簡潔，立論有據。

《魏晉清談》之創見有四。一、對清談名義之創見：作者就「清談」的名稱提出質疑，他指出指魏晉的「清談」一詞根本沒有特指玄談這種用法，他認為「清談」一詞的早期含義與現在的意思有很大的不同。唐君所言，打破了一般學術界對「清談」的成見。一是「清談」是負面多於正面的成見；二是「清談」即是特指談玄的成見。這種突破性的創見，實聞所未聞。二、對清談定義之創見：作者試圖對「魏晉清談」下一個十分簡明的界說與現代的定義：「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這個定義已獲得學界不少人之認同。范子燁先生即認為這個定義不僅適用於魏晉清談，也足以傳達清談的真實意義；余英時先生對此清談之定義也深表贊同。唐氏對清談的定義，幾成定論。三、對清談形式之創見：作者把「清談的形式」列為重要的考察重點，是因為以往研究魏晉清談均偏重在內容的考察上，而清談的形式問題很少人觸及。於是作者在本書〈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分別從「清談的參與方式」、「清談的程序和術語」、「清談的準備」、「清談的理想境界」、「清談的心智娛樂和社交色彩」等五個向度（章節）來談清談的形式問題。四、對清談起源之創見：作者認為魏晉清談起源於東漢末太學裏的「游談」之風，而非目前學術界公認的起源於漢末的人物批評或議論時政（即所謂「清議」）。此說獨具慧眼，言而有徵。如果從清談的「純學術」的特質方面著眼，他的這一觀點更符合清談的歷史實際。

對《魏晉清談》一書之建議有四：一、清談的內容應包含「人物品評」：唐翼明先生以為魏晉人所義界的清談應不包含人物品評。然近代研究清談的學者，大部分還是把「人物品評」放入清談之中，筆者以為清談中仍應有人物品鑒之內容才是，因為魏晉談士熱衷於人物品評，清談應不避談人物。二、清談的遊戲特質應詳言之：作者觀察到清談的遊戲性格，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看法，但作者卻沒有針對此點再加以闡發。魏晉人以清談為戲，考察《世說》與一些史書也發現，當時人們常以「談戲」、「語戲」、「戲詞」、「言戲」等語詞代稱「清談」，可見其遊戲特質；此外，戰爭術語也進入了清談之語境，益見清談遊戲之烈。三、缺乏清談說話藝術的探討：《世說》乃書記載清談之專書，故由此書可探討談

士之說話藝術。該書之編輯原則乃是「以類相從」，有關清談內容的直接記載，主要出現在該書的〈文學篇〉、〈識鑒篇〉、〈賞譽篇〉、〈品藻篇〉等篇，據此四篇可分析清談語言之藝術，其特色如下：（一）崇尚簡約：清談玄風影響一代文學語言風格，阮脩所言「將無同」三字，深契魏晉玄學家不落言筌之精神風貌。（二）運用修辭：魏晉清談中的人物品評，幾乎完全擯棄抽象的語言，極借助形象的比喻來表現人物的姿容、才情、風神。如王衍使用了「懸河寫水」之意象，喻示郭象之辨才滔滔。談家還使用其它之修辭法，如排比、設問、引用等，不一而足。（三）注重聲調：魏晉談士亦相當留心語言中的聲調音韻之美，如王濛曾自詡在「韶音令辭」方面，劉惔不如他。由此可知魏晉清談不僅造就一代哲學思潮，同時也將說話藝術推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四、可以闡論清談對學術的貢獻：魏晉談家往往是藉著談辯以建立並充實自己的思想，故其所好之圖籍常是談辯時的資料來源，而其手成之著作也常是談辯後的思想記錄。唐翼明先生也認為「筆談」，可以視為清談的另一種補充方式。而清談活動也造就了魏晉經史子集四部的輝煌成就。以經部而言，今天所傳的《十三經注疏》，《易》為魏王弼注，《論語》為魏何晏集解；王、何可謂清談大師，然其對經學的詮解，儼然有成，且足以承先啟後。可見魏晉談士並非空疏淺薄之徒。合理的推測，魏晉談士應不迴避經義之探討。以史部而言，四部中的史部始於魏晉成立，史學脫離經學附庸的地位而獨立，許多的體例規模也是在此時發展成熟的。其中，「人物傳記」最是蓬勃發展，這現象與清談息息相關，故魏晉史學中「人物學」的發達，實不能抹煞清談的功勞。以子部而言，與清談最有關係者，首推道家類，而清談名士涉足於其中者不下十數家，存留至今著如王弼之《老子注》，向秀與郭象之《莊子注》，皆享譽極高。以集部而言，魏晉之清談名士都有專集傳世，可見當時清談名士並非空談不學之徒，其思想、言論、文章可資傳世者不為不少。

就整體而言，唐翼明《魏晉清談》雖有小瑕疵，但仍不掩其學術的豐沛內容，在魏晉清談的研究上，依然是嘉惠學者，且為必讀之書。

徵引文獻

古籍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

近人論著

- 王力：《漢語史稿》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王葆玆：〈讀《魏晉清談》〉（《孔子評論》，1994年）。
- 王葆玆：《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仁愛書局，1984年）。
-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
- * 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年）。
- 洪漢鼎譯；H.G.Gadamer：《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
- * 范子燁：《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
- * 唐翼明：《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 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賀昌群等著：《魏晉思想》（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 * 楊勇：《世新語校箋論文集》（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
- 臧要科：〈魏晉清談：語言遊戲——以伽達默爾的遊戲概念為視角對魏晉清談的分析〉，《蘭州學報》總第144期（2005年），頁87。
- 劉正國：〈給魏晉清談以公正的評價〉，《江漢大學學報》第16卷第4期（1999年8月），頁51。
- 劉葉秋：《古典小說筆記論叢》（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
- * 蔡振豐：《魏晉名士與玄學清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諸承明：《縱橫辯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魯迅：《魯迅全集》（臺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

- 蕭艾：《世說探幽》（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
-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
- * 戴璉璋：《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i, Zhen-fong. *Wei-Jin Scholars and Metaphysics Talk*, Taipei: Dawn Culture Company, 1997.
- Dai, Lianz-hang. *Xuanzhi, Metaphysic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03.
- Fan, Zi-ye. *Study on the Life of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ge*,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2001.
- Lin, Liz-hen. *Research on the Themes of Wei-Jin Empty Talk*, Taipei: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8.
- Qian, Mu.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Taipei: Eastern Book Company, 1993.
- Tang, Yi-ming. *Wei-Jin Empty Talk*, Taipei: Eastern Book Company, 1992.
- Tang, Yi-ming. *Wei-Jin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Tang Yiming's Academic Papers*,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4.
- Wang, Nen-gxian. *Research on Shishuo Xinyu*, Jiangsu: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Yang, Yong. *Papers on Shishuo Xinyu Interpretations*, Taipei: Zhengwen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3.
- Yu, Ji-axi. *Interpretations on Shishuo Xinyu*, Taipei: Zenai Bookstore, 1984.

Analysis of Tang Yiming's *Wei* *-Jin Empty Talk*

Wang, Maio-shun

(Received March 30, 2012; Accepted July 26, 2012)

Abstract

As a unique fashion in the Middle Ages, empty talk offered the best opportunities for Wei-Jin celebrities and literati to present their talents. Empty talk was not only a symbol for them but also a stepping stone to seek an official position or get promotion. Indeed, empty talk had an impact on the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n a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Wei-Jin style.

Tang Yiming's *Wei-Jin Empty Talk* introduced Wei-Jin empty talk in an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manner. The reason why it was independent was the author dealt with empty talk as an independent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stead of a mix of Wei-Jin thought, metaphysics, political or social factors, which was hel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Moreover, the book was comprehensive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ever analysis of empty talk from two perspectives: longitudinally and cross-sectionally. This book discussed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mpty talk longitudin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d its content and forms cross-sectionall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two is the creative ideas of *Wei-Jin Empty Talk*. Chapter three is open questions for *Wei-Jin Empty Talk*. Chapter four i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Wei-Jin empty talk, Tang Yiming, Wei-Jin, empty talk, *Shishuo Xinyu*